

中国共识

中华复兴的和谐发展道路

漆思著

CHINA CONSENSUS
HARMONIOUS DEVELOPMENT
ROAD OF CHINA'S REVIVAL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共识

中华复兴的和谐发展道路



漆思著

CHINA CONSENSUS
HARMONIOUS DEVELOPMENT
ROAD OF CHINA'S REVIVAL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共识:中华复兴的和谐发展道路/漆思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8

ISBN 978 - 7 - 5004 - 7133 - 2

I. 中... II. 漆... III. 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中国 IV. 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8385 号

责任编辑 王 曦

特约编辑 黄德志

责任校对 易 凡

封面设计 高丽琴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插 页 2

印 张 20.75

字 数 330 千字

定 价 3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社会发展理论丛书》

编 委 会

主 编 孙正聿

副主编 孙利天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丰子义	王南湜	乐国安	田毅鹏	孙正聿
孙利天	刘福森	刘少杰	宋宝安	李培林
邴 正	吴晓明	杨 耕	杨魁森	张 盾
张金荣	赵汀阳	周晓虹	贺 来	葛鲁嘉
黄冬梅	谢立中			

代序 发展的标准与选择

孙正聿

20 世纪 80 年代，吉林大学在国内率先创立了社会发展研究所，90 年代中期又组建了哲学社会学院，并在 2004 年成立了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吉林大学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中心，对社会发展理论展开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发展，在其真实的意义上，是人的特殊的存在方式，也就是以社会的发展而实现人自身的发展的存在方式。人的这种特殊的存在方式，既是当代人类面对的最大的现实问题，也是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争论最激烈的理论问题。这是因为，趋利避害的人类生存逻辑，在当代人类的实践活动中、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代社会的发展中，受到了空前的严峻挑战。

发展问题的严峻性在于，发展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它具有不可避免的二重性。人类的历史就是“追求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过程”，它总是以某种“退步”的形式而实现自己的“进步”，“片面性”是历史的发展形式。历史过程中的任何进步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任何正面效应都会伴生相应的负面效应，任何整体利益的实现都意味着某些局部利益的牺牲，任何长远利益的追求都意味着某些局部利益的舍弃。无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说，恩格斯早就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就必然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社会发展研究中的重大课题。

从人与社会的关系说，马克思曾把市场经济概括为“以物的依赖性

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体制的意义上，经济全球化首先是市场经济及其原则的全球化。市场经济按照自己的要求去塑造全部的社会生活，也就把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优胜劣汰的原则融入整个社会生活，这不仅塑造了人的“独立性”，而且构成了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利益最大化的逻辑，而不是幸福最大化的逻辑，构成了现代社会的生存逻辑。对于人类来说，这个生存逻辑是对人类自身的“趋利避害”的生存逻辑的严峻挑战。马尔库塞说，“发达工业文明的内在矛盾正在于此：其不合理成分存在于其合理性中”。这就是当代人类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所面对的最为严峻的发展问题。

把“发展”作为最重大的现实问题而予以研究的社会发展理论，它所面对的理论问题，首要的是对“发展”的理解和评价问题。发展，这不只是对存在状态和存在过程的描述，而且是对存在状态或存在过程的评价，因此，“发展”是以评价为逻辑前提的对存在的描述。这表明，“发展”问题的实质是对存在状态和存在进程如何评价的问题，以及依据某种评价的标准作出行为选择的问题，即在实践中作出各种顺序性安排问题。作为人类生存逻辑的趋利避害，“利”与“害”的标准如何确认，怎样的行为选择才是当代人类的真正的趋于“利”而避于“害”，怎样的顺序性安排才能使“利”大于“害”，这是当代社会发展所面对的根本问题。“标准”与“选择”构成社会发展理论的至关重要的核心范畴。

“发展”的标准具有极为深刻、极为丰厚的文化内涵。它既内涵着文化的多样性，又内涵着每个时代的“广泛而深刻的一致性”；它既内涵着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又内涵着现代化的多元选择；它既内涵着“历史的大尺度”，又内涵着“历史的小尺度”。所谓历史的“大尺度”，就是以人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整体利益”为出发点的反观历史的尺度；与此相对应，所谓历史的“小尺度”，则是以人的“非根本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为出发点的规范人的历史活动的尺度。生活本身告诉我们，当我们离开历史的“小尺度”而仅仅承诺历史的“大尺度”的时候，我们不仅无法实现“大尺度”所承诺的价值理想，而且尤为惨痛的是会使这个“大尺度”所承诺的价值理想变形，把“大尺度”变成某种压抑个人发展的“本质主义的肆虐”；与此相反，当我们离开历史的“大尺度”而仅仅着眼于历史的“小尺度”的时候，我们不仅会失去“大

尺度”的价值理想，而且尤为严峻的是使这个“小尺度”所规范的历史活动危及人自身的存在，从而使人们在这种“小尺度”中感受到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形成了“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也就是形成了“以人为本”的关于“发展”的根本标准。这个“标准”作为“历史的大尺度”与“历史的小尺度”的“微妙的平衡”，构成了我们的行为选择的出发点。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所形成的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以这个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中国政府正在致力于解决社会发展的三大问题：一是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致力于解决公共利益最大化、满足全社会基本公共需求的民生问题；二是致力于解决资源环境体系的压力问题，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三是致力于解决公共治理结构中的政府自身建设问题，推进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这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下的行为选择，也就是我们在经济全球化中对现代性的行为选择。

作为当代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需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在充分汲取国外学者的成果的基础上，推进我们的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我感到，解放思想，首先需要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气魄。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是前所未有的，同时，我国发展面临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这就需要我们以宏伟的气魄和开阔的视野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解放思想，还需要有直面现实的凛然正气。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许多深层次的矛盾不断地凸显出来，它要求理论工作者以直面现实的凛然正气去研究这些深层次矛盾，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来回答这些重大的现实问题。有了这种凛然正气，才能真正地解放思想，提出和探索新问题。解放思想，还需要有创新的理论勇气。对于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解放思想并不只是一个口号，它要求我们：一是要从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当中解放出来，认真地、深入地研究新情况新问题，而不是对我们正在进行的伟大实践作出某种简单化的判断和评说；二是要从唯上唯书、人云亦云的教条主义的研究方式当中解放出来，从我们面对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出

发，对我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提供具有创新性的理论研究成果；三是要从僵死枯燥、言之无物的话语方式当中解放出来，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凝练新的思想和新的语言，作出新的论证和新的阐释。

马克思说：“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社会科学作为社会的自我意识，它的关切点总是自己时代的最为重大的现实问题。人类的趋利避害的生存逻辑，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遇到了空前的挑战，并构成我们时代的诸多的重大课题，引发了我们的共同的关切与期待。愿本丛书的出版能够切实推进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的深入研究。

（一）中国大三大原则：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以人为本，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学发展，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永续发展。社会和谐，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按照共同理想、原则、纪律的要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把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协调好、协调好，把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序言 如何想象中国

赵汀阳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很容易令人激动，因为这是中国人等待已久的现代化发展。中国传统帝国在西方现代帝国主义的挑战下崩溃之后，“中国话语”就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主要由反思、自责、悲愤和救亡的呼声构成，一直到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话语才重新开始了自豪振奋的表述，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创造了中国的现代自尊。不过，由历史原因所导致长期经济落后再次打击了中国话语，一个过分贫穷的国家很难坚持一种过硬的话语，以至于到了改革初期时，仍然非常贫穷的人们甚至在担心中国会被“开除球籍”，这类极其夸张的奇谈怪论表现了中国话语的又一次低潮。邓小平改革在 20 世纪 90 年代终于获得巨大成功，于是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中国话语有了明显的变化，从声称中国可以说“不”到谈论中国的“崛起”，可以看出人们激动或者过于激动的心情。同时，人们开始研究使世界吃惊的“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

在过去，一般都是事后数百年或者数十年才能够对一个历史时期的经验或模式进行有效的分析。不过，这一学术传统已经被打破，人们纷纷以“当代史”的眼光去分析所处时代的经验。“当代史”是一种多少有些怪诞甚至自相矛盾的眼光，因为当代是正在发生的，而且与未来是连续不可分的，因此，以几乎同步的经验去分析经验就只能一半是描述一半是想象。尽管当代史很难保证客观性，但现代人迫切需要迅速地总结经验和模式，这一方面可能是实践的反思需要，另一方面可能是心理或者话语需要。于是有了许多此类研究，诸如当年的“日本模式”、“东亚四小龙模式”以及“南美模式”之类关于或成功或失败的模式的研究。不过，今天的事实证明，关于这些模式的研究是可疑的，尤其是所谓“四小龙”模式。

近年来，关于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或者中国模式之类的研究迅速增

加，中国人关心，外国人也关心。虽然都有见解，但似乎还没有能够获得普遍承认的特别中肯的分析。在诸种分析中，最有趣的可能是甘阳的分析，他相信如果中国能够坚持“通三统”模式，即把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结合起来，就兼备了诸如和谐、平等、社会公正、自由和市场活力等优势。甘阳还声称，这一“通三统”模式也可以称为“儒家社会主义”，而这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深层含义。这种解释是相当令人吃惊的，而且被认为很有争议。就具体的描述和解释而言，在甘阳的煽情分析中值得质疑的地方颇多，不过他看到了“中国道路”的一个基本特征：中国文化的传统优势就是特别能“化”，因此不怕矛盾而且总能够化解互相矛盾的各种原则和观念。事实如此，中国从来都敢于把某些似乎难以结合的原则和制度搞成“中国特色的”或者“中国自己的”道路。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中国化”大师。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中国革命获得史诗般的成功，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经济取得难以置信的成就。中国道路之所以难以置信，就在于中国各方面的条件如此之劣势和弱势，其中各种因素自相矛盾，似乎每一种问题都可以是灾难性的，但当被“化”在一起却创造了成功。这不仅是西方人同时也是中国人自己常常难以理解的事情。

中国改革的成功有着太多的因素，而且有着一种中国式的复杂性，因此，全面深入地描述和分析是极其困难的。不过，假如限定仅仅谈论其中的某一个因素，而且未必是最重要的，那么我愿意说，中国改革如此迅速的成功与其说与传统文化有关，还不如说更与现代中国的一个新传统有关。当人们试图发现一个地方的独特成功的原因时，往往容易想到其独特的文化背景，比如说韦伯就愿意把资本主义和新教伦理联系起来，同样，有人也愿意把中国的改革成功与儒家文化联系起来，诸如此类。此种联系当然有些道理，但未必是真正独特的那一个方面。中国改革的独特成功恐怕与“群众运动”这一中国现代新传统有更多的关系。群众运动源于毛泽东的农民革命运动以及人民战争观念。毛泽东以实践证明，人民一旦被动员起来，其力量是无穷的而且战无不胜，因此人民成为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邓小平把人们最喜欢的财富定义为人民的合法追求目标，政府给政策、给条件、给机会，于是财富以及财富所能够实现幸福生活变成了近在眼前的甘泉而不再是远在天边的海市蜃楼，剩下的就只需要胆量、勇

气、劳动和智慧了。先行者的成功是最好的鼓舞，人们只模仿成功者，无数人立即模仿，最终形成改革的洪流，就像当年的革命洪流一样势不可当，“富起来”成为时代的最强音。由财富所引导的新群众运动是改革成功的最有力的基础。当然，这只是改革的一个侧面。

这里要推荐的是漆思的《中国共识——中华复兴的和谐发展道路》一书。漆思是青年学者，兼有社会学和哲学背景，视野开阔。《中国共识——中华复兴的和谐发展道路》是对中国改革道路或者说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相当全面的分析，涉及改革的许多侧面，而绝非一个侧面，是一本很值得一读的书。至于其中观点是否正确，就目前而言，恐怕很难判断，因为中国改革到目前也只进行了一半，改革远不仅是经济方面的事情，而是整个社会、文化、教育和政治，因此还有许多方面有待下一步的改革发展，这不是人们现在能够提前总结的。无论如何，人们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去描述历史，这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现代经验。

是为序。

2008年3月

导言 为什么要提升中国共识^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将近60年，中国一直在艰辛地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国持续快速的经济社会发展奇迹举世瞩目，在全球化的舞台上中国日益显现出一个发展中大国复兴的影响。国际社会对此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有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的反面渲染，有中国经验、北京共识的积极评价。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来创造中国模式：改革发展的中国特色究竟是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究竟靠什么获得成功？如何从中国经验提升中国共识以推动中国模式的创新？

现代化与发展模式研究是20世纪中期以来国际社会发展理论的重点研究领域，相继出现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新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理论、风险社会理论、社会转型理论、全球化理论等。这些发展理论深入研究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莱茵模式、福利国家制度的瑞典模式、政府主导型的日本模式等比较典型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并对拉美模式、东亚模式、印度模式、俄罗斯与东欧的社会转型模式进行了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模式开始进入了国际社会发展理论的视野，许多著名学者如托夫勒、萨谬尔森、斯蒂格利茨、阿玛蒂亚·森等对中国的改革经验与发展模式给予了极大关注。进入21世纪，中国模式到了反思总结的关键阶段。2004年乔舒亚·库珀·雷默发

① 本书是笔者从事中国模式反思的博士后研究报告，在研究中得到了笔者的博士后合作导师赵汀阳先生的学术指导。“从中国经验到中国理念”这一研究思路来自赵先生在其主编的《现代性与中国》一书所写的序言，其“天下体系”理论及其研究风格对笔者有重要的启发，在此谨致诚挚的感谢！当然文责完全由笔者自负。《中国经验与中国模式：走向天下体系》，《中国经验与中国模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表了“北京共识”^①，旨在超越“华盛顿共识”的视野来总结中国发展经验，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反响。国外发展理论与发展模式研究为我们总结中国改革发展经验提供了重要参考，但这并不能代替我们自己对中国模式的反思和中国共识的创建。

赵汀阳认为：“中国经验是世界经验中最重要和最具创造性的因素之一，或者说，中国经验将是世界文化体系的一个关键性的变量，中国问题将是世界问题的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有着思想学术深度的中国经验思考——中国对自身问题的理解以及中国对世界问题的理解——去重新形成缺货已久的中国理念，即一种源于中国经验的、包含着值得不断展开的思想问题的关于人类生活的基本想象。”^②“当中国要思考整个世界的问题，要对世界负责任，就不能对世界无话可说，就必须能够给出关于世界的思想，中国的世界观就成了首当其冲的问题。已经在舞台上了，就不能不说话。这就是中国现在的思想任务和必然逻辑。”^③中国模式问题迫切需要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理论进行深入研究，目的在于从中国经验提升中国共识以推动中国模式的创新。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理论创新不仅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思想先导，而且成为反思中国经验、探索中国道路、创新中国模式、创建中国共识的学理呼唤。

国内学者在批判借鉴“北京共识”的同时，基本上不认同这一提法，而采用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来概括中国改革发展经验。国内学者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多学科研究：吴敬琏、厉以宁、林毅

① “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是美国投资银行高盛公司顾问、《时代周刊》原外事版编辑、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2004年5月7日在伦敦《金融时报》上首先提出的，5月11日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全文发表了他撰写的《北京共识》报告。该报告概括出了“北京共识”的三个定理：大胆实验，重视创新，使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求变、求新和创新是体现实力的基本措辞；超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衡量尺度，把重点放在生活质量上，追求公平与可持续性的发展；包含一个自主理论，发展不对称力量是应付复杂安全环境的最有效办法。“北京共识”旨在超越“华盛顿共识”，启示发展中国家应根据本国情况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北京共识》的中文版首次载于黄平、崔之元主编《全球化与中国——“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② 赵汀阳：《从中国经验到中国理念》，赵汀阳主编《现代性与中国》，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③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夫、胡鞍钢等从经济学视角对中国市场经济改革道路的研究，郑必坚、俞可平、王绍光、潘维等从政治学视角对全球化与中国发展模式的研究，费孝通、黄平、李培林、孙立平等从社会学视角对社会转型与中国经验的研究，罗荣渠、章开沅、时殷泓、钱乘旦等从历史学视角对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国际比较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社会发展哲学视角来看，高清海1988年就倡导“中国应当有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1999年出版了《社会发展哲学——中国现代化的理性思考》^①，2004年呼吁“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②，这是中国哲学界创建自己的社会发展哲学的学术自觉。当前，发展哲学与政治哲学、文化哲学、价值哲学、人的哲学成为国内哲学界的几大重点研究领域。然而，当前中国模式研究还没有进入中国社会发展哲学研究的主流，缺少哲学层面的深度反思。因此，迫切需要从社会发展哲学视角来推动中国模式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中国共识的自觉创建。

本书主旨在于探讨当代中国模式的发展道路问题：中国的改革发展究竟靠什么获得成功？中国特色的发展逻辑、发展道路与发展理念是什么？如何从中国经验提升中国共识以推动中国模式的发展创新？从社会发展哲学的视角考察发展理论的历史演进逻辑与发展模式的国际比较，重点揭示中国模式生成的历史逻辑，解答中国模式之谜，总结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阐发中国道路蕴涵的中国理念，提升中国共识，探索中国发展战略与制度创新思路。从中国经验到中国共识的中国模式研究，旨在提炼全球化时代中国与世界呼唤的和谐发展观，创建社会和谐发展理论，探寻中华复兴的和谐发展道路。

本书从社会发展哲学视角，对现代发展理论进行评说，对全球发展模式进行比较，对中国改革进行反思，对中国道路进行探索，对中国共识进行提升，形成了如下的基本思路与主要内容：

第一章：现代性历史转型的发展理论评说。在现代性历史转型中，现代社会发展理论演进呈现出了如下的历史与逻辑：启蒙现代性与现代社会理论先驱，探讨了启蒙现代性理念与现代化构想；马克思与韦伯的社会发

① 高清海等：《社会发展哲学——中国现代化的理性思考》，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② 高清海：《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新华文摘》2004年第14期。

展理论，分别从资本的逻辑与社会文化的逻辑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起源与发展命运；现代化理论与后发展理论，探讨了西方原发现代化规划与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主张；新发展观与发展理论的革新，梳理了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发展观创新；社会转型理论与全球化议题，对当代社会转型与全球化问题进行了探讨；现代性发展的反思批判维度，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维度对现代性问题及其理论话语进行了反思批判，从而为发展模式研究奠定现代社会发展理论史基础。

第二章：全球发展模式博弈及话语权竞争。现代化发展模式需要从历史生成中分类比较，首先对英国内源现代化模式与德国外源现代化模式进行分析评说；其次对当代自由市场经济的英美模式、社会市场经济的莱茵模式、福利国家制度的瑞典模式、政府主导型的日本模式等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进行比较，对后发现代化的东亚模式与拉美模式、后发展大国的印度模式与中国模式进行比较，揭示全球多种发展模式之间的博弈；最后对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与社会主义的“渐进改革”进行比较，对“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进行分析，指出围绕各种共识所形成的话语权竞争。这为中国模式的深入研究扩展了广阔的全球视野。

第三章：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与中国共识。中国模式的生成，归功于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伟大创造，取决于现代化转型进程的历史塑造，受制于社会主义实践的路径依赖，根源于中华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破解中国模式之谜，首先考察了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程；其次总结了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再次从中华文明传承、现代化转型、社会主义实践、全球化发展、中国改革的视角反思了中国模式生成的发展逻辑；最后从中国模式的反思中提升出命运自主、文化兼容、学习创新、人民本位、和谐发展的中国共识。

第四章：中国特色的发展理论探索。中国特色的发展理论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探索。从毛泽东的发展理论到邓小平的发展理论，再到后邓小平时代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展示了新中国几代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发展理论的艰辛历程，体现出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相对封闭到自主开放、从阶级斗争为中心到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为重点、从革命发展观到改革发展观再到科学发展观的演变轨迹。中国特色的发展理论探索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五章：中国风格的和谐发展观。反思中国模式的发展道路、发展逻辑与发展理论，需要我们开发中国传统和谐思想并结合时代精神进行提升与创新。为此，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指导思想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提升出“和而不同”、“易和哲学”、“天下思维”、“和谐共生”为主导理念的和谐发展观。从中国传统和中国经验中提升出的中国理念，为推动中国模式的完善奠定了中国风格的和谐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第六章：中华复兴的和谐发展道路。中国模式的发展创新，不仅需要创造新的发展理念，而且需要从基于中国经验的和谐发展理念走向中国和谐发展道路，进行发展战略创新与制度建设。从社会分化到社会和谐的发展战略创新思路、从和谐中国到和谐世界的发展战略议题、从体制改革到制度建设的制度构建方略、从中国理念到中国道路的中国模式创新，指明了中国和谐发展道路的方向：创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型文化四位一体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明模式。

最后，在本书结语中指明从中国经验提升中国共识以推动中国和谐发展道路的探索，特别提醒中国学者要注重以中国话语的自主创建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来推动中华的伟大复兴。

中国共识的提升并非是要刻意向全世界推销一种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只是在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之际对中国经验的理性反思与中国理念的自觉提升，以提醒国人更加理性地把握我们自己的未来并促进中华民族的精神共识；也只是在全球各种发展模式竞相争胜的时代提供一种和而不同、和谐共生的中华智慧的启示，以拓展人类文明和谐发展的可能性。当前，各种讨论中国模式的话语虽然为我们反思总结中国经验提供了重要参考，但我们不能一相情愿地认同所谓“北京共识”、“中国世纪”、“大国崛起”等话语，而要保持邓小平当年所提醒的韬光养晦、忧患意识与创新意识。当前处在生成发展中的中国模式，实际上内部潜藏着种种深层次的制约性、脆弱性甚至危机性的矛盾，社会理论界应对此保持清醒的理性反思意识，认真总结中国经验，提升中国理念，促进中国共识，完善中国模式，探索创新道路，使中国模式成为人类探索和谐发展道路的成功

尝试。

总之，中国共识的提升源于对中国30年改革发展进行历史反思的时代呼唤，是对中国改革经验与发展模式的理性思考，是对“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思想回应，是对中国和谐发展道路的理念提升，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中华民族发展命运以及人类发展前途的真切关爱。实际上，正如中国模式的探索仍在前进的路上一样，中国共识其实就蕴涵在中国人民实现自己光荣与梦想的伟大历史实践之中，等待着每一个中国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创造来发现证实！